



后殖民生态视域中的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研究

张弛^{1,2}

(1.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非小说文学作品一直备受评论界关注。在《幽暗国度》中,奈保尔用西方批评家的视角嘲讽了印度文化中的种种不足。而在《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他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印度在民族复苏过程中遇到的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文章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通过剖析奈保尔笔下充满殖民暴力的环境书写与残留在印度社会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唤起读者对后殖民语境下的发展问题的再思考,呼吁重建一个种族平等、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印度;发展问题;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15)02-0117-07

印裔后殖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分别于1962年、1970年、1990年三次造访母国印度,并以其在三个不同时期印度旅行的经历为基础出版了《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尽管在其第一次印度之旅中就曾试图用追访溯源的心态还原母国记忆,但作为在英国教育体制中成长、用英语写作、读者群主要为西方英语国家读者的作家,奈保尔不可避免地以西方白人上位者的审视眼光批判了脏乱贫穷的印度,他笔下的母国没有成为“童年中的那个神话国度”,而依然是一个“黑暗的地区,残留着他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散发出异常浓厚的英国殖民气息^[1]。带着这种思想,奈保尔在第一眼见到这个黑暗的国度时,就表达了失望之情,甚至在他尚未到达印度的旅途中,他就产生了不祥的预感。阅读奈保尔第一次的印度书写,读者无法了解到印度真实的社会景象与生态环境,只能看到一个早已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构建起来的“经验性的印度形象”,而这种过于主观的经验性形象无法帮助笔者还原印度在后殖民时期展现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

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两部游记中,奈保尔的主观书写方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奈保尔转而试图对印度纯粹的历史进行真实书写,他不再回避这个黑暗的国度,而是直面它并试图理解造成黑暗现状的原因。这种对母国历史现实的初步接纳是奈保尔从西方殖民者批判立场向印度被殖民者文化价值观转变的第一步。这样的转变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这部著作中,奈保尔通过以访谈为主的写实模式,真实地展现出了印度社会的全景图。书名中的“叛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和暴动,它指的是印度人民在思想意识上的激进复苏,这种复苏为印度带来了“一份凝聚的意识、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这些都是殖民时期的印度所没有的^[3]。这种复苏还将使印度免于遭受西方霸权思想和宗教教义的侵袭、垄断和压制,是印度全面复原的主要动力。这种叛变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抵抗,印证了以解构西方世界的霸权意识,关注后殖民时代滋生的

收稿日期:2014-10-28

基金项目:南京林业大学高学历人才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语后殖民三杰作品研究”(GX1201324)

作者简介:张弛,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E-mail:sunnyiceman@163.com。

环境问题,主张第三世界与西方世界、人与动物平等共处为核心指向的后殖民生态批评^[4]。

一、作为文学理论的后殖民生态批评

战后,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思潮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的视野中。旅法非裔学者弗朗兹·法农先后(Frantz Fanon)在1952年和1961年出版了《黑皮肤白面具》与《地球上受苦的人》,对被殖民者的心理及其文化进行了剖析。当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时,后殖民批评才正式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界。后殖民批评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其关注重点是由殖民而产生的“另类”或“他者”^[5]。生态批评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首次在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6]。生态批评的定义出现于1996年,谢莉尔·格洛特菲尔蒂(Cheryll B. Glotfelty)在其著作《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中将生态批评称为探求“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7]。通过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分析,生态批评家们旨在从多角度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复杂原因,重新构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进入二十一世纪,生态批评呈现出观点多元化、题材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正如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中预测的那样,生态批评将激发“文学和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对环境的持久关注”,并借此关注来加强公众对诸多环境问题的关注意识:“地球的命运”“人类在觉醒中行动的责任”以及“环境非正义的可耻”等^[8]。

虽然后殖民研究与生态批评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但两者均视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托,试图解构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堡垒的西方白人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9]。后殖民研究与生态批评在核心批判上极为相似:后殖民研究将矛头对准了以西方白人中心立场构建出的社会架构,这种架构被视为殖民者权利主宰的领域,与被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生存空间形成对照;而生态批评批判的是以牺牲其他生命形式为代价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主宰的自然界遭受了一系列环境危机,如温室效应、空气污染等,人类自己严峻的生存环境与其他物种日益消亡的残酷现实形成对照。此外,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都涉及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通过分析殖民者撤离后遗留的文化殖民行为,后殖民批评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建构一种新的人类种族关系。生态批评试图改变目前以人类为主自然为奴的异化的主奴关系,建立一个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和平共处的生态系统。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eess)在其论文《论深层和浅层的生态学》中就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生态学者应该用同等的价值观对待在整个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和其他生物。人类的生活质量部分建立于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形式共处时所获得的深度欢愉和满足感上,但这往往会使人类忽视他们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依赖性,并试图将与这些生物的共处模式构建成一种主奴关系,这也将最终异化人类自己^[10]。

正是由于上述两种批评理论的相似性,加之后殖民批评的开放性与环境批评隐含的必要的跨学科性——“所有自然科学分支以及人类科学的整体领域在潜在意义上都与其有着更大的内在关联在”——两者的相互借鉴和最终融合才得以成为必然^{[8]143}。然而直到2010年,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与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共同完成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一书,才让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存在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有了一套阐述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基础,这也标志着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的正式诞生。现在广义上的全球化可被视作基于经济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近代殖民主义的延续,是后殖民理论家热衷于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延续涉及的威胁与利益早已从人类社会蔓延至整个自然界,受到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任何对这些问题的批判都要求批判者同时具有后殖民理论与生态批评视角。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新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得到广泛的接受。

二、刻画充满殖民暴力的城乡景色

广义上的田园书写(Pastoral)是指那些明确或隐晦地与城市文学对立的,以描写乡村景色为主的文学形式。尽管田园书写的发展呈多样化趋势,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艺术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等诸多对立社会现象之间的张力与矛盾,这种被劳伦斯·布伊尔称为拥有多重结构的田园书写依然难以避免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表现”,无法反映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也无法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方法^[11]。从后殖民生态视角出发,哈根和蒂芬认为传统的田园书写为欧式的“感性意识与形式一直为中产阶级服务,它采取消极回避的策略,羞于面对社会的不公”^[12]。然而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刻画出的自然场景并不美丽,他真实地刻画了丑陋的城市与乡村的景色,其间充斥着殖民暴力的痕迹,“执拗地提醒着人类努力的局限性。”^[13]

作家下榻的旅馆中,旅馆的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车辆尾气留下的褐色污渍,窗下是市场绵延、低矮的屋顶,市场外面的步行道路面已经碎裂,与周围的浅沟连成一片。然而在破败的市场对面竖立着一栋英国人盖的红砖小楼,结构对称,样貌优雅,与市场的气息格格不入。在作家看来,这座仿佛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年代的古老建筑依然表现出信心,虽然它的古典装饰现在看来很是怪异。毫无疑问,这座红砖建筑所表现出的“信心”其实就是对过往殖民时代繁荣的追忆,这种信心想要掩盖的是现实中印度人艰苦的生活:楼外的居民为了生计做着各种微不足道的工作,无事可做的男人们满脸不悦,“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受苦。”^{[3]371}印度乡间有很多墙厚顶高的房子,住起来很舒服,有柱廊、阳台以及额外多开的窗子。这些房子与破败的乡间景色相比显得过于豪华,印度官员在乡下都住这些典型英式风格的房子里。虽然殖民者离开后这些房子已经完完全全属于印度,但它们却“仿佛把印度远远地隔离开来”^{[3]305}。这些典型的英式风格的房子将平民的生活与官员的生活再次割裂开来,就像它们曾在殖民时期同样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区分开一样。后殖民理论家罗卜·尼克森(Rob Nixon)认为殖民地的田园景色就是殖民文化撤出之后遗留的暴力体现^[14]。作为对民族文化身份进行界定的辅助工具,浪漫的田园景色在殖民期间界定了极端对立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印度独立之后,田园风建筑变成了残留的殖民文化遗迹,而楼中的居民却变成了上层种姓的印度人。这些“优雅的”“住起来舒服的”披着欧洲浪漫田园风格的伪装外衣的房子与印式传统平民建筑风格迥异,无形中加大了种姓制度造成的阶级立场差异。

然而,丧失了自主创造性的印度文化在一定层面上使得这些遗留的田园伪装迟迟不能在社会中自然消解。印度的建筑既不考虑实用性,也不考虑是否与周遭环境相配,只是机械、肤浅地模仿殖民者的风格,比如孟买全是单调乏味方方正正的密集高楼群,马德拉斯的建筑只是钢筋水泥搭成的丑物,新德里的住宅群落让居民艰苦的热带生活更加艰辛。独立后印度的建筑群“非但未能激发人们对美丽、雄伟、发展前景的赏识,反而助长了印度的丑陋、拥挤以及日渐严重的肉体煎熬”^{[3]306}。通过对城市建筑的写生,奈保尔把印度的城市现状与殖民者曾经所处的时代串联起来,透过历史反观印度的现实。历史上的印度数次被侵略、被征服,这些残酷的经历让印度历史逐渐失去了主导的方向。印度人对西方建筑风格的盲目模仿不仅体现出了他们对屈辱历史的误读,而且进一步反映出殖民暴力残留的影响。

虽然殖民者早已撤出,他们却给印度留下了随处可见的英式建筑;虽然名义上印度早已独立建国,但民众仍习惯于被殖民时期的生活方式,不愿创造拥有民族烙印的独立文化。这一点在加尔各答尤为明显。历史上,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中心。在建设时,英国人强行把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移置到这座亚洲城市里,以彰显西方文明在印度的全面胜利。独立之前,英国人为加尔各答配备了完善的交通系统和公共设施,包括宽阔的道路、广场、可以开发的河流等等。然而直到奈保尔于九十年代初期第三次造访印度时,仍然可以看见这个英国人建造的城市,因为自独立以来,这里没有建造任何新的建筑。奈保尔这样评价:“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他们不再统治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3]308}作家在这里使用了虚实颠倒的书写方式,因为加尔各答的这些建筑本该随着

殖民者的撤离而死亡,进而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现实却是这些殖民遗迹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阻碍印度本土建筑拔地而起的障碍。这里的“死亡”所指的并非是城市本身,也不是这座城市中残存的殖民文化,而是暗指印度居民逐渐衰亡的自主创造力。创造精神的丧失使得印度人失去了主动选择权,只能被动地活在殖民者建造的城市遗迹中,每时每刻遭受残存的殖民暴力的侵扰。

三、打破西方霸权主义的思想桎梏

哈根和蒂芬指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挑战发展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并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些挑战和质疑通常和激进的第三世界批评家们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将发展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伪装外衣,一台优先为西方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庞大设备^{[12]27}。要想取代这台盛行多年的统治机器,后殖民生态批评有必要正视生态批评强大的跨学科兼容性,发动其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乃至文化艺术领域的潜力和动能,再次审视传统殖民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为殖民地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当地人的视角构建符合当地环保意识的生态环境。

在文化殖民主义的众多遗产中,语言,尤其是被殖民者对英语的使用和崇拜,无疑是亟待解决的头号问题。以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为例,殖民侵略是英语在印度传播的原始动力。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发展,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西方教育体系,英语作为英国文化的载体正式进入印度人的生活。在印度独立,殖民者撤离之后,印度依然是当今世界上第三大英语使用国。英语在印度被视为第二附加官方语言,隐隐有取代官方语言印地语的趋势,因为英语是印度主流作家创作的首选语言,也是印度的教育语言。对于印度来说,西方殖民者通过英语向印度人灌输的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理,对他们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这本写实风格的游记中,受困于语言和文化的桎梏却又试图保护本土文化、挑战英语权威的矛盾结合体处处可见。

湿婆军的高层主管戈提先生在纺织工厂区长。从后殖民生态视角来看,纺织工厂这一意象一方面象征着英国曾经先进的工业技术即传统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残留;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将植物纤维这样的自然元素利用传统殖民科技转化利用的必要途径。戈提先生的办公室外门上印有湿婆军的老虎标志,这表明他对印度本土宗教的信奉,对本土文化的关注。然而在办公室内的墙上挂着的彩色老虎照片上却写着英文:“You observe a lot by watching”^{[3]70}。挂在房间内的印有老虎和英文的石油公司海报与挂在外门上的湿婆军老虎标记揭示了发生在戈提先生身上的文化冲突。外门上的标志让路过办公室的所有路人人都知道戈提先生的宗教信仰,而在一人独处的办公室内,他潜意识中更希望面对的是写有英文的老虎海报。此外,戈提先生位于顶层的、整洁的办公室传达出“权利和荣耀”意味,这与楼梯间昏暗的通道、天井里成堆的垃圾以及弥漫在底层的阴沟味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相对意义上的上层人,戈提先生一方面试图保护印度宗教在生活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根除英国殖民文化对其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在谈及家人问题时,这种对立在戈提先生的话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在被问及妹妹的容貌是否漂亮时,戈提先生用英语回答“Not totally. Fair.”^{[3]77},却用印度人左右摇头的方式表示肯定的立场,这种东西兼顾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中也经常遇见,不少初学英语的中国学生在用英语回答是否问题上往往会使用汉语的逻辑来表述英文的答案。中国学生使用中式英语句式的错误可以被归咎于汉语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把这种表达方式放入印度的后殖民语境中来看,这恰恰反映了英语作为强势的殖民语言对弱势的本土语言马拉塔语的欺凌和压制。此外,戈提先生在谈及集体宿舍其他楼层横流的污水时说孟买永远不会变得漂亮,因为它有一些本质的缺陷,“有一些是人的问题,人们缺乏公民意识(Absence of civic sense)。”^{[3]74}他用殖民者的语言对地位稍低的同胞发出的谴责显示出他对本国语言的蔑视,似乎本国语言和它的使用者一样都缺乏了所谓的公民意识。这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语言歧视往往和种族歧视,民族歧视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奈保尔笔下仍然存在着坚守本土语言的印度人。一位曾在班加罗尔任教数十年的高中物理教师从小接受英语教育,是整个家族第一个就读英语学校的人。到了晚年,他却花了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用地方语言撰写科学书籍。他认为地方语言才是改革的途径——“用民众的语言来谈

科学”^{[3]173}。用地方语言写就的科学读本代表了这位印度民族意识已然觉醒的教师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现状的反思。达利特黑豹党的创立者南德欧·达萨尔以达利特诗人著称,他坚持用印度本土的马拉塔语创作,并曾将自己住在红灯区与妓女和罪犯为邻的生活经历出版成诗集。奈保尔对南德欧的写作形式与诗歌背景并无赘述,仅以“文笔自然、使用达利特独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标明了南德欧与其他诗人的最大区别^{[3]106}。与奈保尔自己使用英文创作相比,南德欧的马拉塔语作品更是显示了他对英语这一殖民语言的抵触。奈保尔与南德欧的对话耗时甚久,因为南德欧一直坚持用马拉塔语交流,奈保尔只能等待查鲁的翻译和总结。然而,文化殖民行为是无孔不入的,在谈话的最后,南德欧也不免用英语自嘲说“现在的我太正常,太有教养了”(Now I am too much normal and gentleman)^{[3]129}。

英语在印度的盛行与无孔不入的特性与挪威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其著作《语言帝国主义》中率先提出“语言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相互印证。菲利普森试图通过分析特定语言在殖民过程中的同化政策,对语言背后的帝国主义的霸权本质进行解构。在2009年的续作《持续的语言帝国主义》中,他强调“语言是西方帝国主义扩张与殖民侵入行为中影响最为持久的遗产,在亚洲不少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中,英语依然拥有根深蒂固的稳定地位”^[15]。虽然英语的普及一定意义上危害了印度本土语言的发展,甚至将导致部分语言的消亡,但不论是在戈提先生还是物理教师亦或在南德欧身上,笔者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他们对本土语言的热衷,这对于消解英语的进一步入侵,重振印度本土语言的活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语言,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对话在艺术和建筑领域也得到了体现。在果阿城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期间,殖民者在曼多维河畔修建了许多葡萄牙风格的建筑,它们在四周景致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壮观。然而奈保尔指出搭配这些建筑的最佳景致应该是“新世界的无人荒岛”,而非“经历过古老印度混乱历史的拥挤村镇”^{[3]156}。换言之,这些葡式建筑与如今的印度社会格格不入。葡萄牙殖民者厌恶偶像崇拜,试图通过烧毁印度教寺庙抹杀扎根印度社会体系中的宗教文化。然而四百五十年后,他们在印度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残缺不全:曼多维河畔矗立着几座大型军事碉堡的废墟,在欧洲印刷的果阿景物版画成了游客用餐时的纸餐垫。葡萄牙诗人卡蒙希的雕像曾经竖立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建造的果阿广场上,现在被圣雄甘地的雕像取而代之,果阿的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诗集,甚至没有什么人听过他的名字。在如今的果阿,葡萄牙的文化只留存在博物馆里。相反,缺少欧洲新知识和新科技的印度教,非但没有被葡萄牙殖民者连根拔除,反而在两次被殖民的夹缝中安然存活了下来。正如奈保尔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印度教经过了历史的种种曲折演变,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覬覦冒犯,它却再度茁壮了起来”^{[3]159}。这里,印度教在印度社会体系中稳定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虽然殖民地文化依然残留,但印度社会中保有的隐性本土文化元素终将打破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桎梏。

四、重新审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

后殖民研究和生态批评之所以联合的重要一点是人类亟需重新从现实角度考虑人与动物和自然之间时时变动的关系^{[12]12}。五十年代,工业化被视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被认为是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扩大就业的良方。当时的印度政府认为独立会加速印度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早在四十年代末期出台的《产业政策声明》中,印度政府就已决定兴建炼钢厂,发展重化工业和重型机器制造业^[16]。此后,印度政府在1956年再次出台了《产业政策决议》,并强调国家急需重工业快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程度的规模化。但是,由于印度本身不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急于求成的工业化让印度的自然环境饱受摧残。

游记中的班加罗尔是座古老而又有新气象的城市。自从独立以来,班加罗尔原先吸引退休人士的温和多雨的自然气息吸引了大量的重工业^{[3]167}。工业发展当然给城市带来了积极的意义,班加罗尔因此得到了发展,成为印度太空研究的中心,各大科学研究机构位于这里。然而,奈保尔并没有刻

意赞颂欣欣向荣的发展气息,相反,他认为工业的发展并不能掩盖它对自然造成的创伤。他将发展前的班加罗尔比作大王公的花园城市,而现在,这座花园的林荫道上充斥着汽车的噪音和废气,人们不再享受地漫步其中。

工业化的盲目、粗暴与残酷还扩散到人对动物的态度上。正如生态批评关注的不仅仅是作家对自然的书写,它更多地关注到人类与非人类、非人类各物种之间的彼此关联^{[11]15}。一位科学家脱离了现实和需要对农业器械进行了所谓的“改良”。他设计了一种便携式的农用喷洒器,它的外壳内安装了一个沉重的马达,足以让农民因为长期的背负而残废。这种将人机器化的行为是与人类将动物他者化的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后殖民生态批评反对将动物等同于机器的行文和书写,当然不用说将人与机器相提并论了。农民睡在牛车上去集市,车队如田园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走向市场。这个农民在醒来之后会用自救的方式赶牛,在牛的肛门上插木棍。奈保尔认为这是“田园诗中不受注意却必不可少的部分”^[17]。由此可见,人对动物的粗暴态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对自然麻木不仁的毁灭性的态度是人类社会在数千年的理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产生的^[18]。哈根和蒂芬认为动物地位的下降总是受人类的牵连,尤其受西方白人统治者的牵连,尤其是在他们试图以兽性疏远或摧毁其他人类社会时。他说“统治阶级总是将非其所属的人类个体与文化视为低人一等的动物,这种视人为动物的他者化也是导致奴隶制和种族屠杀的主因”^{[12]135}。科学家以想当然的科学技术将农民视为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而农民又用同出一辙的态度对待动物。

不同于工业化对自然暴烈的直接影响,印度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间接地影响了自然在人类眼中的形象。诗人南德欧在一首引以为豪的诗中这样写道:水也学会了种姓的偏见^{[3]123}。对他而言,水并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意象他从小就被教育,上层种姓对河水的使用保有优先权,即上层种姓使用上游河水,贱民使用下游河水。南德欧回忆幼年时与没有种姓偏见的上层种姓孩子一起游泳时,被守卫认为污染了河水,遭到处罚。这痛苦的经历使原本中立的自然意象在诗人的心中发生了扭曲,与残酷的种姓制度联系到了一起。诗人从内心深处对种姓制度持抵制态度,所以,他根本无法热爱在他看来拥有阶级立场的水。

当然,我们并不能仅仅把自然环境的恶化全部归咎在印度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这一外因上,或是将之推托给根植千年的印度教文化,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人。因为二十年前的灌溉工程没有设计排水系统,也没有考虑泥土的性质,如今,盐碱地问题成了拉贾斯坦邦的科塔地区眼下最大的技术难题。工程不仅没有解决当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洪水泛滥,如今这片土地满是沟壑切割的痕迹。1947年印度分裂之后,新印度获得了83%的旧有人口与84%的土地面积,但这些土地中只有19%的灌溉地,面积约1840万公顷^[19]。为了解决农耕问题,统治者将水利问题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加任何限制,滥建了大量的水坝和水利系统,却不进行任何行之有效的管理。《印度:受伤的文明》取材于奈保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造访印度的经历。“二十多年前”印度正处于独立建国后的起始阶段,水利工程名义上服务于民众,实际却服务于新印度的统治阶级,使得他们的政权在独立初期得以稳固。但他们的这种速成心态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缺水的问题,转移了民众的视线,从根本上却破坏了整个印度农村的自然生态系统。统治者仅仅下令建造了水坝和灌溉工程,却没有考虑任何它们可能带来的后续影响。可见,水利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造福于民,而是将矛盾的焦点和带来的损失转嫁给民众。钟再强指出后殖民生态批评以文学手段介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引导曾经的被殖民者抵制隐含的文化帝国主义,拒绝西方霸权思想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幌子的同化行为^[4]。印度统治者虽然在文化身份上有别于西方殖民者,但他们打着发展的旗号,以巩固自身利益为目的破坏自然的行为与西方生态殖民行为同出本源。这种剥削式的影响表面上只在印度农村范围内造成危害,但长远来说,其影响必将向国际化发展。

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生态危机的紧迫性,他们在二十年后派出专员和副手们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专员们只能解决技术问题,无法触及造成这一难题的根本:“世代以主子的荣光为自己的荣光”的底层民众不会主动地有所作为^{[17]26}。虽然印度早已独立,但印度百姓的心态并没有从往日为奴的惯性中走出来。他们习惯于执行高高在上的殖民者们发布的命令,却从不考虑这些命令是否有益。

对于独立之后新政府采取的放养式水利发展,村民们觉得无从下手,只是机械地依照以往的农耕习惯进行耕作,只收取农作物的最顶端,把大量的精华浪费在田里。这种对待自然的机械、消极的态度使村民们只能黯然生活在辉煌文化曾经营造出的精神庇护所中,“人为”成为了一种“虚妄的概念”^{[17]30}。这种对自然放任不管的消极态度带来了恶性循环,稻田变成了稀疏的沼泽地,雨水腐蚀了道路上的石板,活力从这里彻底消失了。

五、结语

奈保尔对印度三次书写的视角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在第一次造访印度时,作家用西方批评家的视角嘲讽了印度文化中的种种不足;第二次造访时,作家试图以同情者的视角渐渐融入印度文化中,并探求造成文化创伤的内部原因;第三次造访时,作家终于重新建构了自己在《幽暗国度》中抛弃的印度母国人身份,以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视角聆听了印度普通民众的话语并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虽然奈保尔最终完成了思想和精神上的漂白,认同了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立场^[20],但作家叙事视角从主观到相对客观的转变还是给世人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发展中的印度以及发展时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这样真实的展现无遗会唤起读者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殖民残留问题及生态问题进行再思考,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以牺牲自然利益与环境正义为代价换取经济和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后殖民社会中共同面对的生态难题,奈保尔笔下真实反映出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 [1] 奈保尔. 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 李永平,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10,30.
- [2] 黄子淑. 为印度历史塑性:V.S. 奈保尔的印度形象书写——以“印度三部曲”为例[D]. 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1:5.
- [3] 奈保尔.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M]. 黄道琳,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553.
- [4] 钟再强. 后殖民生态批评:回顾与反思[J].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66-172.
- [5]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75.
- [6] Mazel D. *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 [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1:1.
- [7] Glotfelty C, Fromm H,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xviii.
- [8] 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 刘蓓,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 [9] 冯翠翠,李颖. 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的关系[J]. 温州大学学报,2007(9):78-82.
- [10] Drengson A, Inoue Y.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M]. Berk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5:4.
- [11] Gifford T. *Pastoral* [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1999:2.
- [12] Huggan G, Tiffin H.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M]. New York: Routledge,2010:83-84.
- [13] 朱峰. 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2012(5):129-160.
- [14] Nixon R.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45.
- [15] 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 Continued* [M]. New York: Routledge,2009:1.
- [16] Thorpe S, Thorpe E. *The Pearson General Studies Manual* [M]. Delhi: Pearson Education India,2009:221.
- [17] 奈保尔. 印度:受伤的文明[M]. 宋念申,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147.
- [18] Plumwood V. *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M]. New York: Routledge,2005:8.
- [19] Verma N P. *Irrigation in India: Themes on Development, Planning,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M]. New Delhi: M. D. Publications Pvt. Ltd,1993:19.
- [20] 张弛. 奈保尔:一颗被漂白的心——论《幽暗国度》与《抵达之谜》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文化认同[J].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36-140.